



# 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状态的调拨与未来方案探寻<sup>1)</sup>

董浩 靖鸣

**摘要** 学术状态不仅是一个学者学术精气神的体现，而且是一个学科整体学术面貌的写照。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状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新闻学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学术行动中孕育而成。鉴于此，文章以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五次主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努力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状态调拨的历史，并结合新闻学发展现实，探寻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建构方案。研究发现，我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先后经历“新闻学中国化的探索”“中国式的新闻学”“人民新闻学”“中国特色新闻学”、新闻学“中国学派”等阶段后，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状态。当下的新闻学“中国学派”发展阶段是我国建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各方面条件再一次成熟的时刻。因此，中国新闻学者应抓住此次发展机遇，秉持高度的学科主体意识与学术自觉意识，在赓续学脉的基础上，响应时代召唤，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关系论等方面采取学术行动，提高中国新闻学的知识创新能力，进而建构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性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 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学派；中国特色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董浩，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南京林业大学文旅产业与城市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江苏南京 210037；靖鸣，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37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50703.001

自 1834 年近代中国“中文报刊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新闻纸略论》发表以来，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至今已有 190 多年的历史。在 190 多年的历史里，经过几代新闻报人、兼具报刊活动家身份的政治家与新闻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虽几经波折，但依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概言之，即中国新闻学从无到有，由术入道，从小到大，从自发到自觉<sup>[1]</sup>，先后建构起各种范式的知识体系，如“中国式的新闻学”“人民新闻学”“中国特色新闻学”和新闻学“中国学派”等，从而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后，新闻学人积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特色哲学

1)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时代青年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媒介生成机制与提升路径研究”（2024XWC005）；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新闻学中国方案”（A201101）。

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在新闻学迎来学科大发展的同时,我国新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扰,尤其是受西方新闻与传播理论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冰火混搭”的现象。因此,如何应对中国新闻学面临的这种尴尬而急迫的发展现实,进而彰显其自主性,成为当代新闻学人需要思考的时代课题。

为此,当代新闻学人围绕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目标、任务、路径展开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和探索<sup>[2]</sup>。但总的来讲,学界已有的关于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很多是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中发展,或者存在新闻传播学的预设,而很少自觉地从彰显或突出新闻学学科主体性、自主性角度进行研究。鉴于此,本文以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五次主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努力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状态调拨的历史,并结合新闻学发展现实,探寻其自主知识体系未来的建构方案。

### 一、从自发到自觉: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状态的调拨

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一定主体依据自身意志(立场和倾向)、认知方式和认知结果,针对一定对象构建的知识体系”<sup>[3]</sup>,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需要集纳多种社会主体及意志,并使其相互协调、兼容,包括不同社会主体自主性、知识体系自主性、知识体系是否符合国家战略与主权等众多方面。因此,自主知识体系有着不同的形态。具体到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也是如此。从碎片化到体系化,从模糊到清晰,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在的政策号召到内在的学术意识驱动,从依附西方到学术独立、自主,中国新闻学人自新闻学在中国诞生以来,一直在不断努力建构不同形态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新闻学中国化的探索”“中国式的新闻学”“人民新闻学”“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构想以及新闻学“中国学

派”等就是中国众多不同形态的新闻学知识体系建构行动中的比较“醒目者”。尽管,有时是学者个人自发的学术志趣与行动,有时是学界集体行为,有时是国家、政治号召下学界积极参与的大规模的学术研究。它们之间有连续,也有断裂;有继承,也有创新;有激进,也有保守;有学术行动,也有仅是学术口号;有遗忘,也有再次被激活;有学术,也有政治,但它们始终是标记与刻画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状态调拨的“学术节点”。

#### (一) 新闻学中国化的探索:新闻学引进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命题的萌发

在我国现代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由于许多学科都是从西方引入,因此,我国学科或学术知识体系面临着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何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化”问题。学科或学术的“中国化”问题可以追溯到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明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sup>[4]</sup>。尽管,有学者也将“中国化”与“本土化”不作区分,通约使用,但根据郭忠华的研究可知,在“中国化”“本土化”“中国特色”“中国学派”“自主知识体系”等概念的使用情况方面,在1949年之前使用的主要是“中国化”概念,1979年后至21世纪初主要是“本土化”“中国化”概念,晚近则主要是“本土化”“中国特色”概念<sup>[5]</sup>。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化”“中国学派”“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概念再次回潮<sup>[6]</sup>。鉴于此,本文采取“中国化”概念来探索新闻学移植中国、建构自身知识体系的历程。其后,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末先后开始各自学科的中国化发展。差不多在同时期,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等新闻学人也注意到西方新闻学理论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提出并发起了新闻学的中国化探索实践。总的来讲,早期新闻学人主要完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新闻学中国化工作。

首先,为了培养中国新闻学研究人才、实践人才,早期中国新闻学人创办了中国新闻学



教育。虽然,1912年全国报馆俱进会就提出设立新闻学校,但遗憾的是此事尚未成行,此会就宣告解散。直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中国新闻学教育才真正开始。

其后,上海圣约翰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平民大学等纷纷设立新闻系或新闻学部……随着这些新闻教育机构培养的新闻人才走向新闻界,不仅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新闻也有“学”,切实感受到新闻学的价值,而且有一部分毕业生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如杜绍文、郭箴一、陶良鹤、王文彬等<sup>[7]</sup>。与此同时,以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为代表的新闻教育机构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本土的新闻学教育模式,即从“横向移植美国模式”向“纵向扎根中国本土”转变<sup>[8]</sup>。

再次,中国早期新闻学人结合当时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实际与中国本土新闻业的现实需要,自发地对中国新闻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不仅形成了一大批国人自编的新闻学教材与著作,而且初步构建了中国早期新闻学的知识体系。鉴于我国新闻学深受西方新闻学的影响,早期中国新闻学人编撰了许多结合本土实际的教材,如1919年徐宝璜编写的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编写的中国第一本应用新闻学著作《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编写的中国第一本采访学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等等。虽然,国人自编的新闻学教材与著作仍深受西方新闻学影响,但已开始觉醒关注中国新闻业实践问题与总结中国经验的意识,并自觉探究“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如新闻定义与价值、关于新闻纸之性质与职务等<sup>[9]</sup>,初步建构起以理论新闻学、业务新闻学、历史新闻学为基础的新闻学知识体系。

总的来讲,在我国新闻学发展的早期,尽管新闻学界满怀建设“以中国为立场和方法的新闻学”<sup>[10]</sup>的热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不够充分与深入。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进行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除了新闻记者、报刊经

营者之外,还有传统文人、政治家、革命者等利用报刊宣传自己的主张,以至于尚处于不发达状态的中国新闻业被赋予了很多超出了自身承受能力的社会功能。因此,如何从理论、方法上对此进行抽象概括、研究与回应,一直是新闻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命题。但由于当时的新闻学人“身处其中”而很难意识到新闻从业者的多元身份就是决定新闻业在中国发育、建构结果的最为特殊的因素。而以政治、业界、学术等为标准,将中国新闻学划分为政治新闻学、业界新闻学、学术新闻学<sup>[11]</sup>,并开创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传统,就是中国新闻学对如何理解新闻从业者多元身份的回应。所谓的“业界新闻学”,是指新闻记者、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者等对新闻的采、写、编、评等实践新闻学的研究与探索;所谓“学术新闻学”,是指以新闻业为研究对象,以更好地引导以新闻业发展为主要目的的新闻学者从学术的角度对新闻学进行探究的研究趋向;所谓“政治新闻学”,是指报刊活动家、政治家从报纸的社会功能出发,着重探究报纸的启蒙民众、改良社会、救亡图存、服务人民功能的新闻学研究趋向。

(二)中国式的新闻学:我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首次集中探索

为了推动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以黄天鹏、杜绍文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当时中国新闻学进行反思之后,提出了自己关于新闻学中国化的学术主张,如黄天鹏提出的“中国式的新闻学”;杜绍文提出的“新闻学之新理论的新体系”;张季鸾提出的“中国特有之新闻学”,等等。其中,以黄天鹏提出的“中国式的新闻学”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传播最广,但“中国式的新闻学”并不是黄天鹏个人的独创,而是在蔡元培、徐宝璜和邵飘萍等新闻学前辈的思想基础上及其与张季鸾等同辈学者的相互激发下,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和新闻事业的实际情况提出的<sup>[12]</sup>。所谓“中国式的新闻学”,是指黄天鹏在1930年提出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学科建设目标与理



论体系的设想。为实现“中国式的新闻学”的学术设想，黄天鹏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黄天鹏开宗明义地提出自己的学术建设构想，即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并不断更新与发展。例如，1930年起黄天鹏就明确提出并不断更新关于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的学术构想；1930年至1931年，他还分别从唯物史观和大众的角度提出，要“建设新 Journalism 的理论造成新闻学的中心”<sup>[13]</sup>，“我们要从唯物史观来解决新闻业的实际问题，从大众的出发点来做新闻业社会化的运动，由这两点来做新 Journalism 的理论的中心，就是我们所建设的新的‘新闻学’”<sup>[14]</sup>。

第二，为了早日建成“中国式的新闻学”，黄天鹏一方面倡建促进学术交流与研究的平台——北京新闻学会，主编中国第一份新闻学术刊物《新闻学刊》，创建第一个全国性新闻学术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研究室，不仅自己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新闻学书籍，据统计其出版或编辑新闻理论类著作23种、新闻实务类6种、新闻历史类16种、文集类8种、新闻作品集类11种，提出了整套的新闻学丛书编译计划并亲力亲为地编撰，如整理了《新闻学论文集》《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演讲集》等众多新闻学术文献，编撰了“逍遥阁新闻学丛书”“天庐新闻学丛书”。另一方面，他通过开展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和新闻史研究，完善与丰富了以新闻理论、新闻实务与新闻史为主要内容的新闻学科体系框架，同时开中国新闻学史分期研究先河，等等<sup>[15]</sup>。因此，黄天鹏被誉为中国新闻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总结者与组织者<sup>[16]</sup>。

故由此可知，黄天鹏围绕“什么是新闻学”“怎样建设新闻学”等问题展开思考，发起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提出了建设以新闻本位为中心的、能够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新闻学”“新 Journalism 的理论”等建设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新闻学中国化进程。不过，由于20世纪初我国新闻学主要受以对新闻业务的归纳为主、偏重职业化培养的美国新闻学的影响，在知识架构、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等

方面远不及其他社会科学，导致中国第一代新闻学家们很难如同时代社会学家那样能够形成清晰的“中国学派”构想并展开行动<sup>[17]</sup>。因此，当时，中国新闻学的发展虽然有一些新变化，但“不过是量的集聚，并不构成全局性的质的跃进”<sup>[18]</sup>。

（三）人民新闻学：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案

继黄天鹏提出新闻学中国化的学术新闻学构建方案之后，中国新闻学界接力推进新闻学中国化、建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当属政治新闻学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方案——“人民新闻学”。所谓“人民新闻学”，是指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价值上以人民为中心、在实践上以人民为主体，在新闻实践方面“不是为了报道而报道，而是要指导实际工作和群众思想”<sup>[19]</sup>的无产阶级新闻学。“人民新闻学”作为无产阶级新闻学首次在全国范围的应用，作为我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案，它的建设几乎是与新中国的建设同步、同频的。

首先，改造新闻事业为“人民新闻学”奠定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国民党败退后遗留下来的新闻事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之发展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另一方面，将原来解放区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为面向全国的新闻事业。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政治属性、数量与传播能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基础，而且是无产阶级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前提。

其次，发展、完善党报理论，并将其更新为“人民新闻学”。“人民新闻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萌芽的无产阶级新闻学，但其真正成熟是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的改版之后所形成的党报理论开始的。但此时“党报理论”并没有取得全国性的政治、学术统治地位。党报理论获得全国性的政治、学术统治地位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而党报理论发展、进化为“人民新闻



学”，则缘始于1950年11月吴冷西在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sup>[20]</sup>。在讲话中，虽然吴冷西没有对人民新闻学进行专门的解释，但他提出的人民新闻学确实顺应了全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并在无形中推动了社会主义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

再次，编撰专属于无产阶级的新闻学教材与专著，构建人民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新闻学界不仅翻译了许多苏联新闻学教材与著作，如《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学教学大纲》《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大纲》等，还编写了无产阶级新闻学教材与专著，如《坚持社会主义办报路线 肃清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中国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现代部分）》《新闻理论讲话》等，而且有计划地组织、编撰社会主义新闻学丛书，如以穆青、郭超人为首的新华社党组曾计划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丛书”、胡绩伟主编的“新闻学研究丛书”等。通过翻译与编写无产阶级的新闻学教材与专著，逐渐形成了以阶级话语为主要分析工具与逻辑线索，以“革命史观”为基调，以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为主要内容的人民新闻学知识体系，并奠定了中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研究范式<sup>①</sup>。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学术政治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学术范式与脉络的角度来讲，人民新闻学在新闻学中国化、建构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均具有范式性意义。只是后来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与“文革”的发生，人民新闻学逐渐偏离正常发展的轨道，走向过度政治化、教条化、八股化，如语录新闻学的盛行，

严重损害了人民新闻学的政治和学术地位。

（四）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构想：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时代脉动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传入并迅速在中国新闻学界传播开来，具有自己鲜明学术独立性、自主性的人民新闻学不仅受到曾经作为其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反扑，而且面临着如何消化、吸收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回应社会与学界对新闻学的质疑，重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因此，学界提出“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构想”作为学术旗帜，号召学界同仁积极行动来予以回应。

第一，当时的新闻学者初步形成了极具新闻学主体性与自主性的对待传播学的基本态度，即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sup>[21]</sup>为主要内容的“16字方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新闻学者还明确提出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sup>[22]</sup>。但这并没有改变后来中国新闻学发展式微、遭到传播学反噬的局面。

第二，通过“保卫新闻学”“新闻有学无学”“关于新闻学是走向黄昏，还是迈向辉煌”等学术论辩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新闻学的学术地位与身份，为新闻学赢得了长足而宝贵的发展时间与空间。在西方新闻学、传播学的冲击下，人民新闻学在消化、吸收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前，首先面临着来自新闻学界自身与社会的各种质疑。因此，为了捍卫新闻学的学科科学性、主体性，以郑保卫、李彬、唐远清等为代表的学者发起了保卫新闻学，捍卫新闻学学科合法性、主体性的学术行动与号召。他们共同捍卫的新闻学主旨是论证新闻学的理论性、

① 以《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现代部分）》《新闻理论讲话》为例来讲，它们的主要内容具有典型的人民新闻学知识体系特征。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事业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现代部分）》共分为五章，讲述的是从“五四运动”时期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1975年北京市朝阳区工农通讯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三级工农兵学员编写的《新闻理论讲话》共分六讲，分为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办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闻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新闻报道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等。参见：周伟明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557、560。

科学性与合法性地位；开展的核心性的学术行动不仅包括利用讲学、参加各种会议的机会，为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大声疾呼<sup>[23]</sup>，而且包括发表相关学术文章与专著，驳斥“新闻无学论”，论证新闻学的科学性，如《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与郅书锠同志商榷》《不是“独头蒜”，是“并蒂莲”——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思考》《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保卫新闻学”：略论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等等。

第三，在学习、吸收西方新闻学、传播学知识的基础上，加速完成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转型与更新。“作为这个‘现代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初期的新闻传播研究主要完成了几项相互承继的任务：一是努力推动新闻传播理论从‘政治化’向‘科学化’转型，以此完成对中国前一个历史时期传播理念和传播机制的涤荡；二是建构‘人类传播’由落后到先进的一套历史主义叙述，以此确立西方社会商业传播模式下各种原则、伦理的合法性，并廓清中国传播业的具体转型路径；三是提出了信息服务、受众需要、媒体属性、商品机制、新闻法等理解现代传播机制的‘元问题’，框定了日后新闻传播研究政治想象力的边界。”<sup>[24]</sup>中国新闻学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与传播学融合在一起，更新着自身的知识体系。但可惜的是，这种融合并不是以新闻学为主的融合。

总的来讲，通过“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构想”的提出，中国新闻学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与学术身份，完成了自身知识体系的更新。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构想”更多的是在一种被迫回应现实与学界对新闻学的质疑状态下提出的，在疲于回应现实与学界对新闻学的质疑中，缺乏更深入、系统的学科思考，新闻学知识体系更新不够充分，且不够自主。

（五）新闻学“中国学派”：新闻学自主

知识体系建构的自觉状态

2022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之后建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逐渐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目标，中国新闻学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因此，当代新闻学人纷纷积极、主动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以自身切实的学术努力贡献着智慧与力量。

首先，一批认识到新闻学的重要性，关心、重视与致力于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学者，在接续“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构想”的基础上，从根据与必要、主体构成、立场、目标、新闻实践、问题、概念、原则、中层理论、学术史、范式、“三大体系”、学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等视角或层面对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研究与讨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与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直接相关的科研项目立项，如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新闻学丛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新闻学中国方案”，等等。

其次，一些学者直接开宗明义地提出建构“新闻学中国学派”的建设构想，并不断开展学术行动，发出学术号召。所谓新闻学中国学派，是指经过徐宝璜、邵飘萍、蔡元培等新闻学知识体系奠基者们，黄天鹏、杜绍文等致力于发展与完善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建设者们，郑保卫、李彬等不断保卫新闻学合法性地位的保护者们的共同努力，当代新闻学者根据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与新闻传播实践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在国家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之后，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创新和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又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新方案。其中，以李彬、赵月枝等学者提出的关于新闻学“中国学派”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根据他们在“中国新闻





学丛书”的序言《总序：新时代 新征程 新闻学 新探索》中的论述可知，新闻学中国学派是指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中国新闻学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从梁启超到邵飘萍，从邹韬奋到范长江，从邓拓到穆青，从延安窑洞人民广播的手摇发电机到数字时代融媒体，一代代中国记者以及学者以其辛勤耕耘和开创性工作奉献了无数心血和智慧，为中国新闻学及其学派奠定了厚实基础。而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中国道路日渐开阔，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将新闻学列为与文史哲等相提并论的十一门重点建设的支撑性学科之一，中国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的日益醒悟，中国新闻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sup>[25]</sup>。

总的来讲，新闻学中国学派是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可行方案。因为新闻学中国学派既顺应了国家战略的发展需求，又获得了拥有深厚知识积累、丰富中国经验的中国新闻学界的积极响应。在政治自觉与学术自觉的双重加持下，新闻学中国学派已经将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状态从自发状态推到了自觉状态。现在，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可谓是形势大好，但问题也不小。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我辈是否具有足够自信，摆脱制约中国新闻学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学术殖民”心态<sup>[26]</sup>。

## 二、新闻学的中国方案：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建构方略

中国新闻学人一直在不断地尝试建构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将新闻学中国化的学术理想，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完成的学术任务不同。但直到今天，中国新闻学才真正获得建构具有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充分条件。因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仅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意志，而且当代新闻学者在继承历代新闻学人积累的丰厚的新闻学知识与在传播学的冲击下长时间地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已具备建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储备、能力与学术信心。因此，

站在这一新闻学发展的新起点上，中国新闻学者应秉持着高度的学科主体意识与学术自觉意识，响应历史与时代的召唤，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关系论等方面采取有力的学术行动，提高新闻学知识的创新能力，进而建构起既具有中国特殊性又对世界具有普遍性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本体论：梳理与比较多元新闻本体论，明晰中国新闻本体论的特质

新闻本体作为对到底“什么是新闻”这一本原问题的追问，一直是新闻学理论研究中的恒久话题。纵观学界对新闻本体的研究可知，我国学界共形成三种具有启发性的关于新闻本体的见解：一种是事实说，即新闻是事实，如“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二是信息说或报道说，即新闻是信息或报道，如“新闻是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三是手段说，即新闻是手段，如“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sup>[27]</sup>。但仔细分析后发现，尽管学界已有的三种关于新闻本体的认识均有着其自身的逻辑与科学性，但它们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即脱离社会语境、社会实践，在逻辑、概念的世界中谈社会现实。实际上，事实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社会实践中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在一起的。而中国新闻学在新闻本体论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从中国社会语境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讲，一方面，理解中国新闻学，需要认识到中国新闻学在新闻本体论方面的政治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新闻学的政治性。但中国新闻学的政治性并非“政论文章”“文人论政”“政党报刊”“机关报”等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而是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家国情怀意识。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之所以具有这种家国情怀意识，是因为中国新闻业早期的职业化之路比较多元，除了走类似于西方的专业化、职业化之路之外，还有一种从传统文人跨界、转型为新闻从业者的特殊职业化之路，如王韬、严复、

康有为、梁启超等。另一方面,随着各种数字媒体技术飞速发展,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新闻传播实践经验,以至于新闻本体论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即在当前的数字媒体环境下,新闻本体的显现已不再以静态事实为主要形态,而是表现为动态的事实流动,从线性的“表征客观性”到辩证的“过程客观性”<sup>[28]</sup>。而将动态的事实、过程实践等作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与现实线索,能够促进中国新闻学在不同的本体论基础上生发出多条概念、命题、理论建构的进路,从而建立起与其他学科交流、对话的学术通道。

因此,从新闻事实与社会语境、实践、价值、观念相符的角度来讲,中国新闻学应在全面、系统梳理与比较多元新闻本体论认知观点的基础上,明晰中国新闻学在新闻本体论方面相较于西方新闻学的政治属性特质、建立在丰富多样的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基础上的动态事实性、过程实践性,并学会在带有中国特色、中国经验的本体论“透镜”下认识、理解中国新闻学,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精神气质与特色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

(二)价值论:直面新闻学价值观问题,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新闻学作为一种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门学科,其实践需要以应然层面的价值原则来称量实然层面的真理原则,从而让实然的真理原则符合应然的价值原则。更具体来讲,即实然层面的真理原则要求新闻学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是新闻学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而应然层面的价值原则则要求新闻学要按照具体的价值主体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使之适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sup>[29]</sup>。因此,新闻学除了需要服从实然层面的真理原则之外,还需要接受应然层面的价值原则。而纵观中国新闻业职业化的历程可知,在中国新闻业运行的底层逻辑中,始终浸染着传统儒家的家国情怀与自我期许意识。故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需要继承这一理想主义底色、特色。具体到

当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新闻学则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下,按照“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反映世界与改造世界,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好,来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而且从来不回避自己的价值立场,而不像西方国家貌似不讲价值立场,以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示人,但实际上,却无处不体现自己的价值立场。一言以蔽之,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立场与宗旨就是始终把中国人民放在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体到学术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任何理论与方法后面都有一套价值观,理论武器后面是价值观,没有价值体系的支撑,就没有核心<sup>[30]</sup>。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培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基石,毫无疑问更需要直面价值观问题,遵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三)认识论: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更新中国新闻学研究概念与命题

中国新闻学应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在继承中国新闻学已形成的优秀理论、传统的基础上,更新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命题,为孕育中国新新闻学知识体系奠基。以“人民新闻学”为例来讲,在当代社会,阶级话语、革命话语似乎早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为一种被遗忘的话语,中国新闻学也似乎已放弃或者部分放弃以阶级话语、革命话语,并将其更新为以科学话语为基础的“现代新闻学”。纵观中国当代新闻学教材可知,在当下中国新闻学教材构建的知识体系中,以阶级话语、革命话语为基础的人民新闻学已被肢解或稀释得“寥寥无几”,更谈不上什么体系化。而实际上,阶级话语、革命话语的产生不仅有着其特殊的时代语境,正如应星所言,阶级斗争似乎在战争年代主要表现出来的是夺取政权的政治内涵,但这往往使人忽略了阶级斗争概念所具有的更为重要的伦理内涵,夺取政权只





是革命的手段，通过阶级斗争谋求社会平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新世界”，才是革命的真正目的<sup>[31]</sup>，而且即使在今天依旧具有一定的社会解释力，比如阶级话语转化为阶层话语之后，阶级话语依旧是解释当代社会的重要概念与视角，男女平等话题、二孩政策的报道与社会讨论等都涉及阶层话语。具体到新闻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命题，更是如此。比如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如何借助“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国内舆论与国外舆论的关系；如何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新闻战斗性的论述来认识与指导当下中国应对西方发起的针对中国的舆论战、认知战；如何在借鉴毛泽东提出的“新闻、无闻、旧闻”的新闻报道策略基础上开展国际传播工作；如何借助中国共产党的新闻通讯员队伍传统，建设主流媒体的互联网平台；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本土的新闻工作理念“政治家办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与西方新闻工作理念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等。

与此同时，除了以人民新闻学为代表的政治新闻学传统之外，中国新闻学传统还有业界新闻学传统、学术新闻学传统需要继承与创新。在业界新闻学传统方面，如何借鉴过去新闻业采纳新媒体技术的经验来做好媒介融合工作；如何认识与处理职业新闻与参与式新闻的关系等；在学术新闻学方面，如何根据当下新闻发展的现实，借助中国学术新闻学历史上提出的“大新闻学”“新新闻学”“广义新闻学”等概念来更新新闻的定义，重启中国新闻学研究等。

（四）方法论：以辩证 / 历史唯物主义为纲，建构中国新闻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必须有一定的方法论支撑。正如有学者所言，对一门学问的研究，若能上升到方法论层次，则说明其研究已具备了一定的理论高度和深度<sup>[32]</sup>。而概览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方法论则会发现，中国新闻学一直在发展与寻找适合中国新闻学研究

的方法，并且也形成了一些方法，如李公凡提出的历史的研究法、观察的研究法、比较的研究法、实际的研究法<sup>[33]</sup>；李彬提出的新闻社会学；王润泽提出的从媒介、实践视角研究新闻学；蒋建国、卞东磊、刘晓伟提出的从阅读史的视角研究新闻学；杨保军提出的从哲学视角研究新闻学等，但一直未发展出独属于新闻学的方法论。

方法论与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方法论是方法的方法，是具体方法的哲学，从外延上来讲，方法论概念大于方法概念，即同一种方法论中可能包括若干种具体研究方法。简而言之，即方法论是抽象的，是没有办法直接运用的，但方法则是具体的，是可以直接运用的<sup>[34]</sup>。与此同时，方法论又深受认识论、价值论的影响。故通过比较方法论与方法的区别以及方法论与认识论、价值论的关系来反观中国新闻学研究方法论可知，中国新闻学研究并没有发展出与认识论、价值论相配套的方法论，因此，在此种新闻学方法论指导下发展出来的具体的新闻学研究方法，虽然数量不少，并且均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解释力，但并不能解决新闻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结果是新闻学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新闻学研究反而越来越乱，新闻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始终被搁置与忽视。

故为了改变新闻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缺陷，中国新闻学人应借助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契机，以辩证 / 历史唯物主义为纲，沿着抽象的阶梯升降，链接新闻实践、理论与方法，发展出独属于中国新闻学的方法论。辩证 /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辩证、联系、发展、总体的思维方式，十分适合新闻学这门以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新闻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因为这不仅有助于解决本体论层面新闻学研究对象窄化的问题，打破从广义新闻学探究新闻与各种社会现象关系的壁垒；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从狭义新闻学到广义新闻学的本体论认识变换为中国新闻学研究提供了能够通过抽象阶梯进行概念化的研究对象。故以辩证 / 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新

闻学本体论、认识论的转换与概念化,沿着抽象的阶梯将新闻实践与理论相链接,同时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中国新闻学一定能够发展出属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并孵化出一系列与中国新闻学发展实际相配套的具体理论与方法。

(五)关系论:以广义新闻学为基础,妥善处理与传播学的关系

在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如何处理与传播学的关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中国新闻学发展到今天,与传播学融合在一起已成为一种既定事实,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学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甚至有逐渐被传播学取代的发展趋势。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融合过程中,新闻学的消失与弱势以及一直以来新闻学沉迷于新闻实务操作,而缺乏概念提炼能力、理论建构思维,以至于在概念与理论生产能力方面十分不足,这些年来“新闻”的话语和研究少了,传播学的锋芒似乎刺破了新闻学的想象<sup>[35]</sup>。

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探讨方面,概览我国新闻学学术发展史可知,新闻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中国新闻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与传播学的关系。总的来讲,学界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是新闻学从属于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分支;一种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一种是在将新闻学分为狭义新闻学与广义新闻学的基础上认为,传播学取代了狭义新闻学,而广义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独立发展<sup>[36]</sup>。虽然,这三种观点均有各自的道理,但仔细分析后发现,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中,新闻学似乎总是处于被动的一方,而相对缺乏积极、进取的姿态。

而事实上,新闻学是有着融合传播学,形成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广义新闻学的可能与潜力的。如胡翼青从新闻属概念界定视角切入认为,由于已有的新闻学研究将新闻的属概念界定为“报道”,使得新闻的定义常识化和操作化,缺乏理论谱系和脉络的支撑。但通过将认识新闻的属概念视角变换后会发现,从报道主体、受众认知和媒介呈现等方面,可以把新闻

的属概念界定为信息生产、知识型和景观呈现。而这些属概念联结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社会学和现象学等一系列理论脉络,可以有力地支撑新闻学由规范性学科走向探索性科学。常识化的知识体系折射出“新闻学的贫困”,对新闻属概念的重新界定有利于全面审视新闻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激发新闻学的想象力。<sup>[37]</sup>

因此,中国新闻学者应树立新闻学的学科主体意识,通过概念化与学术脉络的链接,妥善处理与传播学的关系,进而构建出既具有理论性,又能融合传播学的广义新闻学。具体构建方式包括:坚守和保留狭义新闻学的家底和传统;调动新闻传播知识共同体的集体行动,撬动板结的知识结构;用超限的能动性和想象力去直面极速变化的新闻场景和迅速激增的不确定性,发掘多元变量之间的关系逻辑,用新的知识逻辑去穿越乱花迷眼的新闻现象和问题丛林。<sup>[38]</sup>

### 三、结语

综上可知,我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先后经历了“新闻学中国化的探索”“中国式的新闻学”“人民新闻学”“中国特色新闻学”、新闻学“中国学派”等阶段后,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状态。当下,新闻学“中国学派”发展阶段是我国建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各方面条件再一次成熟的时刻。因此,中国新闻学者应抓住此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秉持高度的学科主体意识与学术自觉意识,响应历史与时代召唤,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关系论等方面采取学术行动,不断提高新闻学知识的创新能力。相信经过中国新闻学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够建构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一定世界普适性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从而为世界提供新闻学“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孙尚如)

### 参考文献

[1] 董浩,骆正林.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百年历史回顾与当代发展阐释——兼论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三种传统[J].新闻界,



2019 (6): 17-29.

[2] 胡百精. 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J]. 新闻与写作, 2023 (3): 1.

[3]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自主知识体系课题组.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面向与焦点领域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147.

[4] 张乾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史论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230-231.

[5] 郭忠华. 社会科学知识坐标中的“本土化问题” [J]. 开放时代, 2020(5): 101-120.

[6] 向芬. 名与源: 关于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的重思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4 (2): 192.

[7][32] 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 (1834-1949)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405-406.

[8] 向芬, 谭丽. 走出“模糊的冒险”: 刘谡轩“适体新闻教育模式”研究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 158-163.

[9] 徐宝璜. 自序 / 徐宝璜. 新闻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10.

[10] 朱至刚. 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 从知识史的路径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36.

[11] 陈力丹. 世界新闻传播史 (第 3 版)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288-342.

[12][15][18] 曹爱民. 记者与学者: 新闻人黄天鹏研究 [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200; 223-231; 73-146.

[13] 黄天鹏. 新闻讲话 / 黄天鹏. 新闻学演讲集 [M]. 上海: 现代书局, 1931: 218.

[14] 黄天鹏. 新闻学入门 [M]. 上海: 光华书局, 1933: 67-70.

[16] 张振亭、陈玮. 专业化与大众化: 黄天鹏新闻思想及实践初探 [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6): 125-129.

[17] 向芬. 名与源: 关于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的重思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4 (2): 193.

[19] 吴冷西. 人人要心中有数 [J]. 新闻业务, 1951 (4): 1-6.

[20] 吴冷西. 把新华社的报道工作提高一步 / 吴冷西. 吴冷西论新闻报道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7.

[21] 王怡红. 从历史到现实: “16 字方针”的意义阐释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7 (4): 17-28.

[22] 吴飞. 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 [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6.

[23] 樊亚平. “保卫新闻学”与“经世致用”之诉求——评《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 [J]. 新闻战线, 2011 (2): 63-64.

[24] 王维佳. 新时代的知识挑战: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的几个历史性问题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9 (1): 6-13.

[25][26] 李彬. 从清华到河大: 一个黄河学者的新闻思考 [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23: 2.

[27] 陈力丹. 新闻学小辞典 [M]. 北京: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8: 1.

[28] 刘海龙.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 重新理解媒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4.

[29] 张垒. 中国新闻业的源起——从嵌入到融入的实践考察 [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21: 19.

[30] 赵月枝. 中国新闻学传播学访谈录 [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21: 120.

[31] 应星. “把革命带回来”: 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J]. 社会, 2016 (4): 18.

[33] 李公凡. 基础新闻学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 22-27.

[34] 邓树明. 问题方法与论文写作: 传播研究引论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3: 160.

[35] 张晓锋, 骆正林. 新闻的想象: 新闻传播的社会互动和理念创新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1.

[36] 谢静, 张国良.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本刊编辑部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研讨 [J]. 新闻大学, 1996 (3): 3-6.

[37] 胡翼青. 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拓展: 基于属概念界定的视角 [J]. 传媒观察, 2023 (5): 5-12.

[38] 张涛甫. 构建广义新闻学 [J]. 新闻大学, 202 (8): 2.

## The Adjustment and the Outline of Future Plans of the Chinese Journalism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Status

Dong Hao, Jing Ming

**Abstract:** Academic status not only reflects a scholar's academic spirit but also portrays the overall academic appearance of a discipline. The autonomous construction status of Chinese journalism knowledge system is not achieved overnight but has been nurtured through the repeated efforts of Chinese journalism scholars to build a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light of thi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ive active academic efforts to construct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adjust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statu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reality of journalism development, sketches out a future construction plan for it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journalism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 spontaneous to a conscious state after going through stages such a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journalism”, “Chinese-style journalism”, “People's journalism”,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hinese School of Journalism”. Currently, the stage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Journalism” is a moment when all conditions for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journalism are once again ripe. Therefore, Chinese journalism scholars should seize this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uphold a high degree of disciplinary agency and academic reflexivity, continue the academic tradition, 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times, and take a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tology, axi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relational theory to enhance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thereby construct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et transnational applicability.

**Keywords:** journalism;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Chinese School;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uthors:** Dong H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 Communicatio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Jing M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